

中国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渊远流长，并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，与古希腊悲喜剧、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。近日，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、文学博士郑劭荣做客国学讲座——

用经典文化 弘扬戏曲精神

■文/本报记者 许珂 实习生 邹非凡 图/本报记者 颜楚滨



郑劭荣

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、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。它起源于原始歌舞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。传统戏曲在中国的发展历经不同的时期，汉代至宋金的戏剧属于原初形态，包括汉代散乐、六朝伎艺；到了宋元明清，戏剧逐渐走向成熟，南戏、杂剧、传奇等不同的形态极大地丰富了戏曲的种类；清代中期以后则迎来了戏曲发展的高峰，此时的戏曲百花齐放，姹紫

嫣红，地方戏曲层出不穷，“花部乱弹”的梆子、弦索、皮黄等新兴声腔剧种蓬勃发展。

中国戏曲文学的美学特征由其特点决定

戏剧美学，是戏剧学与美学两者之间相互交错和紧密结合而成的一门新的学科，是研究戏剧的美和审美的普遍规律的科学。戏剧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外乎是戏剧美的哲学、戏剧美的本质特征、戏剧社会学等等。但最根本的是研究戏剧美的特殊性，即主要的审美特征。

中国戏曲文学的美学特征是由其特点决定的。中国戏曲文学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具有突变的艺术风格，中国戏曲文学在情节构造上有着与传统叙事文学非常相似的特点，有点像史诗、小说等叙事文学，是一种渐变的艺术。

首先，戏曲之美体现在戏曲的综合性上，即其开放、包容的通融之美。梅兰芳先生曾说过，“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，包含着剧本、音乐、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

第三，戏曲之美还体现在其现

布景等因素。这些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，才能成为一出完整的好戏。这里面究竟哪一门是最重要的呢？我认为全部都重要”。这就意味着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戏曲中都是为表演服务的，都是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。

其次，戏剧之美的表现则是虚拟性与写意性，表演形式的虚拟性基于演员对现实的模仿，并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，虚实交错。“扮不像人的人，说不像话的话。”中国戏曲以虚拟的表现手法来处理舞台时空与现实生活时空的关系；以虚拟的手法来塑造舞台形象，表演动作的虚拟化，如写字、喝酒、刺绣、开门、骑马扬鞭等，无需真实的再现，惟妙惟肖的动作即让观众身临其境。

第三，戏曲之美还体现在其现

场性。戏曲是一种当众展示的表演艺术。它十分注意基于感性的现场情感的展现和陶醉，在剧场中借助演员的唱、做、念、打等各种表演手段，创造出一种诉之视觉、听觉快感的剧场氛围。在川剧表演中，瞬息间变化脸谱，与吐火神功的诡异结合，显示人物内心和剧情的急剧变化及内在张力，成为川剧中刻画人物最有力、最浪漫的艺术手法。

然而，根据文化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，1983 年全国共有 374 个戏曲剧种，到 2012 年已经减少到 286 个，减幅为 23.5%。其中，74 个剧种只有 1 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，处境岌岌可危，面临“团散剧亡”的困境。文化部的数据同时显示，地方戏曲剧种流布范围也严重萎缩，19 个省市剧种减少，

大约只有 40 个剧种能经常参与全国性展演活动。戏曲演出退守农村市场，2011 年全国 2417 个戏曲院团在农村演出 71.54 万场，占总场次的 87.62%；农村观众为 29427.44 万人次，占观众总人数的 79.07%。总的看来，我国地方戏曲院团呈数量逐年减少、剧种活力逐步减弱之势。

有专家分析，地方戏曲之所以面临如此窘境，一是城镇化进程的娱乐方式兴起，戏曲逐步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。二是对戏曲艺术的作用和独特价值认识不到位，扶持力度不够。三是戏曲艺术创新不足，难以与时俱进。人才低端化、观众老龄化，戏曲传承后继乏人。

拒绝科举考试的状元诱惑。

再回到戏曲中所陈赞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发现戏剧中还有对礼赞真爱的颂扬，这与中国的礼教文化是密不可分的。

礼教即礼仪教化，礼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，因其重视名分，又称名教，即以名为教。《礼记·昏义》说：“昏礼者，礼之本也。”《易传·序卦》云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仪有错。”中国古代社会遵循嫡长子继承制：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，嫡长子是嫡妻（正妻）所生的长子，这些现象无不体现着礼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，而戏曲也承担着弘扬礼教的重要任务。



潇湘门城楼史话（上）

■周安林

编者按

日前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回复市政协委员麻小平，完全同意其在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的第 35 号提案《关于重建潇湘门城楼》。近日，衡阳文史专家周安林查询相关史料，撰写了本文，以饕读者。

在湖南伴湘江水系的四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中，岳阳古称巴陵有岳阳楼传世，因北宋名臣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而名扬天下，垂誉至今，成为助力岳阳发展的名片；长沙古称潭州，经历代战火，幸存下天心阁，今建成天心阁公园，为人们怀古思幽见证历史的精神依托物；永州古称零陵，历史的不幸使古迹无存，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永州再造零陵楼，此后又迁走军分区，在原址投巨资再造武圣庙及附属设施，使关羽及其属下有了灵寝安享地，重现昔日盛景，城市多了份看点，一个延绵一千多年彰显忠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衡阳古称衡州，其城的规模堪称大市。南北长 1800 余米，东西宽 500 米，占地 2700 余亩，是湖北襄阳古城（800 亩）的三倍多。城墙周长 4000 余米，有 7 座城楼，而尤以潇湘门城楼以其规模宏伟华丽著称。今城墙与城楼均不存矣！但我们可从地方文献记录中体味潇湘门城楼的恢宏壮观之美。

潇湘门城楼之美源于其潇湘码头之重。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，水路是最佳便捷廉价的选择。以前衡阳县衙门同城，多设在城北，只有清道府衙门设在城南周敦颐读书地濂溪别墅（又名周公馆）南，因周子生于道州，长于衡州，创立道学，皇封“道南正脉”。道府设其居址南寓意弘道归正，弘正（政）为民之旨。

因潇湘门毗邻政府衙门地，成了官员们迎来送往的官码头，从而奠定它成了衡阳的“脸面”，也成就了潇湘街和府前街（后名濂溪巷）的繁华热闹。现载之于《衡阳·清泉县志》的有明朝邑人李寿恺写《重修潇湘门城楼记》，从中可知它的历史和取名的由来；还有陈

宗契写《潇湘浮桥记》，可见其附属景观之盛。以上两文是由本土人写在本土见证过的事，为我们解读先时留下了可观可遐思回味无穷真实有据的历史资料，可见该城楼之重。

衡阳建城始始于后周显德年间，立木栅作为城市防卫的屏障。宋真宗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 年）开始，到宋高宗绍兴年间（1131—1140 年）两兴版图，延到宋理宗景定年间（1260—1265 年）历时两百多年城墙建成，可见工程量之浩大。

到明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 年）复修时城墙高二丈五尺，周长 1277 丈 8 尺，设 7 座城门，进出功用各有侧重。如沿江的阅江门俗称铁炉门，似乎是以生产铁器为主有关商品进出买卖的码头门；宾日门俗称柴埠门，似乎是以经营燃料为主的码头门，柴为当时城市生活必需品，且易引发火灾，占专用码头与江相伴有利防火，交易更便于运输。

潇湘门以潇湘二水合一命名，《重建潇湘门城楼记》有三种说法。一曰：“门以水名必有取尔。”寓意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二曰：“南岳位为离宫，湘水绕其下，离上、下坎（坎卦），有济之义。”离上为火，下坎为水，水火互济则吉；三曰：“门列郡治之左，祝融巽其右，其山镇泽殆，为郡之夹辅者乎。”取二水之命名门意不为山阻，一切通顺之意。

潇湘门城楼宏伟壮观，因在古人认为“城（墙）犹人之衣，城有楼乃人之冠也。”视城楼如人之衣冠至重，无此羞难见宾客，不敢出门面世。有如此之思想，自然行多善为，城楼建得壮观华丽也就必然。

衡阳近世商业小史

■陈先枢

衡阳，明、清为衡州府治，清代并为衡阳和清泉两县治地。民国初，合为衡阳县治。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 年），由县析置市，直属省政府。

清末，衡阳市场以农副产品和小手工业产品交易为主。农副产品多由牙行居间成交，光绪末年（1908 年），有土纸、烟草、土果以及棉花、豆麦等行 16 类 37 家；小手工业有铜器、铁器、钉鞋、木屐、角梳、雨伞、丝线、笔墨等上百户。曹两益伞铺、罗三元器物坊、廖信隆炮竹店的产品较为有名。

经营棉布、棉丝、南货、丝烟等商品的以客帮居多，如闽帮的徐福兴丝烟店，赣帮的惠孚南货馆、至德厚染坊，安徽帮的詹有乾墨局、朱家瑞丝线店，均蜚声遐迩。据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 年）《商务官报》载，当时衡州商业繁盛的街衢，在城内为铁炉门正街，以贩卖工业品居多，每年从汉口等地购进竹布 1000 余箱、洋布 2000 余捆，以及日本、印度出产的棉丝等。另有外国杂货店两三家、经营钟表、石碱、香水、牙粉等。城外河街，以山货土产输出品的行栈为多，邻近各县产品经此输出的，每年有烟草 4.4 万余担，茶油十二万担，大米七八万担，木材 600 万方，其它如茶、靛、纸及豆、麦、芝麻等杂粮，也为数不少。在衡经商者多为赣籍，当时河街之万寿宫，即为赣商集会之所。

民国初期，欧战方酣，外商歇业，国产商品增多，各商户纷纷修饰门面，竞相开业。大户名店中，有纱布业的三义、荣记，洋广杂货业的一品升、范怡顺，书纸业的宝华堂、三让堂，中药业的敬一堂等，市面一度转旺。北伐战争以后，本帮商民力谋发展，店铺增多。据民国十八年（1929 年）《湖南全省农矿工商统计概要》载，衡阳共有服饰品、日用品、食品及其他各类商铺 3689 户，营业人员 12575 人，资本额 309 万余元。城内繁盛，首推南北正街，自北门经南门至回雁峰麓，“珍物罗陈，光灿夺目”。司前街、常公街、道前街、道后街，以及南门外的宣扬街、河街，北门外的仓前街、石狮街等，均属热闹街市。桑园街、泥湾河街、珠琳巷、宣扬街、赖麻口、五福庵、拖泥巷等，则为杂粮业、钱业和手工业类聚地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 年），粤汉铁路通车，本地农副土特产品远运外销，百粤商品源源输入，市场大有起色。抗日战争发生后，衡阳因扼西南交通要冲，成为战时大后方的物资吞吐地。上海的纱布、颜料、香烟、百货、五金、西药等，均绕道宁波、金华、鹰潭、沙

坪、芦苞、老隆等地转运来衡。湘西北的棉花、桐油、药材等在此集散。滨湖谷米、广东食盐也大量向此调集。重庆、昆明、贵阳、桂林及省内长沙、津市、常德等地客商，在此设庄采购，仅供应重庆的布匹，即年达 80 万匹，约占其总销量的 10%。

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（1939—1941 年），为衡阳商业全盛时期，人口由战前（1936 年）的 10 余万人，陡增至 45.6 万人，商业、饮食服务业有 6000 余家，从商人员达 7 万余人。分长沙、广东、江浙、江西、川黔和本地等帮，有同业公会 46 个，商业繁荣，市场活跃，为全省之冠。尤以百货、绸布、南货、粮食、旅馆、饮食、运输业最为发达。与战前比较，百货业由 93 家增至 255 家，绸布业由 73 家增至 220 家，南货业由 23 家增至 123 家，粮食业由 112 家增至 310 家，旅馆业和运输业各增 4 倍以上，分别达 537 家和 100 余家，其他如五金、香烟、茶食、照相、影剧、酒家等，无不激增。工商业区延伸至郊区的白沙洲、江江套和衡宝路一带。还有五桂坊的竟园商场、新华商场，有大小商店 125 家，经营涉及 23 个行业。有些富商巨贾则挤在僻静街巷，经营南杂、海味、纱布等批发业务，如设在王荷坪内的慎昌庄，资本雄厚，吞吐量最大，每次购进白糖数百乃至数千件。

湖南全省数衡阳餐饮业较为发达。衡阳城中一些老餐馆如人民路的宴群园、大华楼、大三元酒家，中山路的楚湘阁、东华楼、石狮街的怡兴园，梓章巷的梓园，常公街（今常胜路）的兢园、九如阁，正殿巷（今和平路）的瀛峤仙馆，后宰门（今和平北路）的小佳乐、醉仙阁，吉祥街的乐福酒家等。其他门店如面粉、糕点店，有新洞庭、新兴园、万香楼、天升阁等，酒菜筵席店如远东酒家、豫章大酒店、四海酒家等，都以各擅其长的佳肴打开市场。

此外还有广帮的南园酒家、白云酒家、珠江楼，川帮的蜀渝、蜀腴、小蜀腴，江浙帮的鸿运楼、小江苏、上海酒家，长沙帮的塑华园、奇珍阁、杨裕兴等。其中南园、蜀腴等以粤味、川菜为主，鸿运楼、上海酒家等以江浙风味见长，长沙帮以正宗湘菜、面粉著称，而衡阳帮则以本土地方风味取胜。

【作者简介】陈先枢，湖南长沙人。清代史志学家陈运溶之后，湖南著名文史专家。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，长沙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，湖南商学院贸易经济研究院研究员。著述百余种，数十次获国家、湖南省及长沙市社科成果奖项。

乐天悯人是蕴含在戏曲里极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

王国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吾国人之精神，世间的也，乐天的也。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，无往而不著乐天之色彩，始于悲者终于欢，始于离者终于合，始于困者终于亨；非是而欲广阅者之心，难矣。”

从此可看出，乐天悯人是蕴含在戏曲里极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，百姓通过戏剧来逃避现实的苦难，寻求人生的意义，获得心灵上的栖息地。由此，戏曲也发展成为了中国人的娱乐消遣的重要手段。

陆游的诗歌《春社》曾这样描绘：“太平处处是优场，社日儿童喜欲狂”。这句诗表明自戏曲成熟以来，看戏成为全民参与、乐此不疲的民间习俗。庙会演剧、节日庆典、迎神赛社、红白喜事等，无戏不成欢。

因此，娱乐成为戏曲的第一要义，逗乐和杂耍成为戏曲表演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清代著名剧作家李渔在诗歌“惟我填词不卖愁，一夫不笑是吾忧。举世尽成弥勒佛，度人秃笔始堪投”中，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戏剧娱乐要素成分的肯定。

其实，在乐天悯人的精神之中，还深藏着戏曲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团圆之趣。在中国戏曲中，生角与旦角大多是以“合一离一合”的结构来进行剧情的发展，戏剧的构成成分多为苦乐相错，悲剧结构多是先悲后喜，绝大多数剧目都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收场，几乎没有西方所崇尚的大悲大痛的“单一结局”。追根溯源，戏曲的团圆之趣与民族心态、民族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，中国人自古相信天地万物都存在“环形结构”，如“金木水火土”就是一个相生相克、循环不息的闭合环形结构。

而崇尚伦理，则是戏剧中与传统文化精神有着紧密关系的另一方面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“厚人伦，美教化”，中国诗学传统中有着悠久深厚的“美刺”传统。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，而儒家文化又以伦理道德为本位。因此，戏曲注重“高台教化”，承担起教化民众，收拾世道人心的功能。

如，在人物选择上，戏曲中往往塑造舍生取义的英勇人物形象。在焦循的《花部农谭》写道：